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阐释

——以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方针政策演进为考察对象

范玉刚 崔文斌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底蕴和精髓,在新的历史方位确立了“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价值指向。从“两个结合”尤其是强调“第二个结合”来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经历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促进与价值引导,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普及和提高”的文艺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新时代“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文化方略,从而促使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合乎历史机缘地出场。在党的文化政策引导和历史逻辑的合力作用下,新时代文化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越来越聚焦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担当。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两个结合”; 普及和提高; “双百”方针; “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3.06.00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主题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是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新方位。一方面,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为其提供精神力量、民族凝聚力 and 世界价值感召力。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①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等问题作了重要论述,为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概括不仅更新了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自我认知,而且为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打开了创新空间。其中,关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全面系统阐释,为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两个结合”,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规律的提炼总结,另一方面又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成功的行动指南。“第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确立的基本原则,“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新时代明确确立的基本原则;二者共同有机构成“两个结合”新思维范式。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一个结合中就有对文化的重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国优秀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进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文化建设思考的视野,只是因为形势需要,革命和建设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从“两个结合”及“第二个结合”的着力点来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历经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逻辑演进和政策促进,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普及和提高”的文艺方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23ZDA081)。

作者简介: 范玉刚,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文学博士(济南 250100; fanyugang@sdu.edu.cn); 崔文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博士(北京 100091; 18101219101@163.com)。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新时代“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文化发展方略。本文通过对三个历史阶段政策促进背后的逻辑梳理,旨在学习、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并更好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使命担当。

一、新民主主义论下的“普及和提高”方针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学习、研究、探索、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进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历程。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谈论“学习问题”时就提出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同志认为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思想理论,而非抽象的思想理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经由民族形式表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有这种“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才有用武之地,它可以拯救中华民族,它可以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它可以延续中华文明的生命周期。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场域得到具体的创造性创新性运用,而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周期。其实,毛泽东同志所指的不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中就蕴含着在“第一个结合”中造就一个既具有中华文明色彩又吸收古今中外文化遗产的自强不息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意味。

在明确主张新民主主义思想前夕,即1939年冬季,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同志合著了一本名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毛泽东同志负责该课本第二章的编著任务。在文章中,毛泽东同志追溯了近百年以来中国革命发展史,并就中国革命运动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就毛泽东同志的观点而言,中国革命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在性质上当前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未来中国革命才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其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思考中,“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话语中就蕴含着关于文化建设理论和方略的新思想。

1940年春季,毛泽东同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代表作,即《新民主主义论》^②。在新思想理论体系下,毛泽东同志对现在阶段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了详细论述。毛泽东新革命理论的理想和使命是让中华民族在政治方面变被压迫为民主自由,在经济方面变受剥削为繁荣昌盛,在文化方面变愚昧落后为文明先进。“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③其思考中就明确包含着对于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反映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并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中华民族特点,主张马克思主义经过民族形式,维护的是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现代科学特征,主张实事求是向前推进,维护的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人民大众特色,主张人民群众的民主,维护的是中华民族的整体需要和利益。新民主主义文化对内反对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

② 毛泽东在1940年1月9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大会上的报告原标题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该报告在2月15日《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标题依然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但是在2月20日《解放》期刊中的标题改为了《新民主主义论》,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沿用了《新民主主义论》标题。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文化。在对此思考的基础上,关于中华文化“怎么办”的问题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其最终的出场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作为一个鲜明的现实问题被提出。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不仅考察调研讨论了中国文艺方针问题,还筹划了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了三天三场:5月2日召开第一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作“引言”讲话;5月16日举行第二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主要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和讨论;5月23日举办第三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作“结论”讲话。中央政治局在第二场和第三场座谈会期间召开了涉及文艺座谈会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文艺问题的根本性原则发表了意见。毛泽东同志认为从阶级立场、态度和情感来看现阶段在延安的很多文艺家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和鲁迅曾经所创作的大量文艺作品是不太一样的,延安的许多文艺作品内容和形象存在着对中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和爱,而鲁迅的大批文艺作品内容和形象更多是对工农阶级的同情和爱。为了解决好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实际问题,“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要注意普及与提高,并以普及为基本的。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方针的基本观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结论”讲话中,根据对延安文艺界实际情况的分析总结,毛泽东同志较为详尽地阐述了当时文艺发展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②,也就是文艺为工农兵和文艺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就文艺为工农兵而言,相比于“大后方”和“沦陷区”文艺界,延安文艺界人士不仅是抗日的、民主的,而且更具有成为无产阶级的现实可能性,要促使他们从根本上转变阶级立场,使他们走进工农兵、向工农兵学习,让他们的文艺作品表现工农兵,让他们的文艺作品教育工农兵。就文艺怎样为工农兵服务而言,在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下,文艺的普及是向工农兵的普及,文艺的提高是从工农兵的提高。文艺普及工作是迫切需要的,延安文艺界急需创作出一批合适的文艺作品来启蒙和教育工农兵大众,在思想观念上提高他们的团结意识和斗争精神。即便是当时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文艺提高工作也是需要的,既包括为工农兵的提高,也包括为教育和指导工农兵的干部的提高。在“普及和提高”方针下,文艺界人士同党领导的工农兵实现了有机结合,所谓具体的中国实际其实包含着文化维度,普及与提高的目的是培育和造就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体——中华文化的主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在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政策促进下,延安等抗日根据地逐渐培育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主体,这些被激发出来的文化力量开始创造新民主主义文化。可见,新民主主义论下“普及和提高”方针的出场和有效实施,合乎逻辑地成为以“两个结合”的思维方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思考与文化使命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文化革命和建设“借鉴、继承和创造”的关系及价值发表了观点。毛泽东同志认为古人和外国人的文化“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这些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但这仅仅是借鉴而不是替代,这是绝不能替代的。”^③虽然毛泽东同志后来对此观点有所修正和补充,但其核心观点依然如同年为延安平剧研究院题词一样是“推陈出新”,其对文化的思考显然有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自然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问题。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0—3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3页。

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第2版。在新中国成立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此处原文修改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882页。)显然,毛泽东此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有了新判断:在强调文化“创造”重要性的同时,承认文化“继承”的意义。

二、人民内部矛盾论下的“双百”方针

随着新中国政权的建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修改稿时,毛泽东同志结合苏共二十大的教训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着重论述了“第一个结合”的“第一次结合”和“第二次结合”。从历史经验教训与中国现实革命和建设使命担当出发,毛泽东同志主张中国共产党人要在思想上实现独立自主,不仅要能够认识中国问题,而且要能够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案,也就是要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与利益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实现“第一个结合”。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在经历曲折之后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结合”的“第一次结合”;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取得像前者一样的预期成功,就需要进行“第一个结合”的“第二次结合”,找出符合中国发展的新道路新理论。这些重要论述确立了相结合的独立自主原则,开启了“第一个结合”的“第二次结合”,为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

就文化建设实践中“第一个结合”的“第二次结合”而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宣传、教育和落实,其实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甚至充满火药味。“百花齐放”口号的提出和新中国初期中国戏曲发展现实状况及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具有因果性。周扬后来的回忆录文本和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讲话纪录文本可以互文实证这一因果关系。周扬回忆过“百花齐放”口号的来源以及毛泽东同志对其的基本态度。关于是否发展地方戏曲的问题是1950年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中国戏曲界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参会者提出应该容许地方戏曲发展,全国各地不同种类的戏曲应该“百花齐放”,不是只容许这一种戏曲发展,而禁止那一种戏曲发展。周扬将这一部分戏曲工作者的看法向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同志非常认同和赞赏“百花齐放”的看法,认为它反映了中国戏曲工作者的意愿和利益,也反映了中国戏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在1951年,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正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且在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同志对“百花齐放”的出处做过补充性解释。毛泽东同志说“百花齐放”来自人民群众,但具体是谁说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可以说,“百花齐放”口号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戏曲发展实际情况的一次有机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又一次成功结合,是其中文化维度的具体化实践。

如果说“百花齐放”口号的提出还略显平静,那么“百家争鸣”口号的提出就已是暗流涌动。“百家争鸣”口号的提出和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具有因果性。关于早期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两位权威学者郭沫若和范文澜的学术观点出现了不可调和性。对此,毛泽东同志给出的解决法宝正是“百家争鸣”。在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同志对于“百家争鸣”的出处也做了补充性解释。毛泽东同志说“百家争鸣”是古代中国先哲提出的一种思想,是对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生态环境的一种描述。从毛泽东同志对“百家争鸣”口号的运用和深入思考来看,这个口号的提出是根据早期中国社会历史分期研究实际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华先秦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有机结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文化实践,是一定历史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的结果,可以说是一次很成功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早期探索。

1956年4月22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在25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27日扩大会议的发言环节中,陆定一关于学术、艺术、技术性质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的关系发表了意见。陆定一主张应当将学术、艺术、技术性质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区分开来。这是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也是一种好的政治思想领导,也是一种好的文化艺术领导。好的文化艺术领导是政治方向性领导,而不是学术、艺术和技术性质或具体问题的领导。陆定一强调,在文化艺术的政治思想领导下,要让学术、艺术和技术有发展的自由。在28日扩大会议的发言环节中,谈论的主题涉及“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口号。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

志所提出“百花齐放”口号在中国戏曲发展中的作用和“百家争鸣”口号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的作用。在扩大会议的最后阶段,毛泽东同志作会议总结。在讲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口号时,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正式提出将二者连在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文化基本方针——“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①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首次对外界公开介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同志在众多场合中全力阐释和推广人民内部矛盾论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直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终稿的完成和对外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十分坚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文化方针的正确性和优先性。虽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确立过程中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但是该方针的核心内核已经深入人心,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人民群众都普遍信奉它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总结了戏曲发展、中国历史问题研究等科学文化发展和研究的规律性认识,吸取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结合了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理想目标,综合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旨在调动包括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和古代当代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科学文化,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包含着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诉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落实,激活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力量,激发亿万人民群众的磅礴激情创造社会主义文化。以此逻辑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内部矛盾论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出场和实践,是“第一个结合”中文化维度的彰显,是“两个结合”思维方式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思考和文化使命的重要环节,也是一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成功探索。

此外,不论1956年8月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②,还是1964年9月对中央音乐学院一名学生来信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都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古今中外”问题的一些基本主张,并为该问题的解决贡献了独特智慧,都是对“双百”方针的补充和丰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文化维度的具体显现,也同样是对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益思考。

三、新时代“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文化方略

(一)新时期文化建设理论和方略的转向与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新时期。在这一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文化艺术界不仅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发展方向,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对“两个结合”思维方式下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理论和方略进行了积极理论思考和具体文化实践。

邓小平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③这一结论一方面恢复了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优秀传统,一方面又试图在“第一个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页。

②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结合”思维方式下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形式和方法。在文化艺术建设路线方面,这一时期中国文艺界的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向,完成了历史性的拨乱反正。1980年《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不仅取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而且还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在文化艺术建设方针方面,邓小平理论不仅要求中国文艺界更加突出强调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希望中国文艺工作者在吸收和发展古今中外文艺技巧中创造出更多能够代表新时期新社会的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完美文艺形式。

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和90年代“左右之争”,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跨入了新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提出了“进一步团结和动员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①的新目标,而且还要求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能够正确处理文化艺术传统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文化艺术优秀传统文化既包括中华民族在中华文化发展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也包括国外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人民在文化艺术发展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对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艺术成果的继承是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创新则是对所有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的一种必然发展结果。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创新不仅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文化艺术精神需要和利益,而且它们本身是辩证统一的,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在文化艺术建设路线和方针方面,中国文化艺术界自觉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同时,中国文化艺术界已经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者紧密关联起来,强调文化艺术“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格外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繁荣发展、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中的基础作用。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聚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文化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内容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这一时期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关于文化艺术继承和创新关系的思想观点。科学发展观下的文化理论和方略在这一主题上有了新发展。在文化艺术发展中,一方面强调继承具有基础作用,一方面强调创新具有关键作用。“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②在文化艺术建设路线和方略方面,中国文化艺术界不仅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而且将“继承和创新”视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两个重要轮子”。在某种程度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提升到同等重要地位,以实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③的重大论断,也进一步表征着“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④。

(二)新时代文化建设方略的明确出场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⑤在创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8页。

② 《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42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④ 习近平:《在传承发展文化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两大奇迹中,中国的和平发展急需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而合乎历史规律地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阐明了“两个结合”及“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容以及其理论与现实意义,还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方略进行了全面系统论述。2023年10月7日至8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①。

历史地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两个结合”及“第二个结合”的出场有着前后相续的逻辑节点。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并且强调要在“两个结合”思维方式下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二是“两个结合”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三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两个结合”,并且将“两个结合”视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原则。四是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作了重要阐述。相比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以及对“第二个结合”的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以及对“第二个结合”的再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回归和发展以及对“第二个结合”的持续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不仅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认知,实现了“第三次理论飞跃”,而且在格外凸显相结合中的文化维度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命题,还创造性地阐述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内涵和重大意义,把文化建设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简言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历史性总结和理论提升,还是指导面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一种理论规划和前瞻思考,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化建设的创新性达到了历史和理论的新高度。

就“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对文化建设的意义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阐述,以及对文化传承发展使命的重要论述,特别是概括性地提炼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文化建设规律的“14个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文化新使命中“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3点强调,愈加明确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实现了“两个结合”的“第三次飞跃”和“第二个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方向和有效路径,表征着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认知更加自觉和成熟,彰显了当代中华文化主体所洋溢着的独立自由、健全完满、自觉自信的精神气象,以及科学对待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基本态度。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自豪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②

结语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实现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需要满足中国人民多层次多面向的美好生活需求和利益,还需要在促进不同民族、区域、国家之间进行交流互鉴交融中丰富人类文明。

^①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0/08/c_1129904890.htm, 访问日期: 2023年10月10日。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以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属于中国人,又属于全人类。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伟力和历史逻辑的合力作用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迈向历史的新图景。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 Logic: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

Fan Yugang¹ Cui Wenbin²

(1.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2.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P.R.China)

Abstract: Among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culture is expected to provide inspiration, to hold the Chinese nation together and to appeal to the whole world. Because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re generalized in a new way, it enables Chinese peopl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on. “Two combinations”, especially the second combination,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t the symposium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t sets the scen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initiative also elucidates the mission of “continuing to promote cultural prosperity, building a culturally leading country and developing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It gives rise to a new thinking paradigm which is composed of the “first combination”, a basic principle established during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been guided by three sets of policies and values. First, it is the literary policy of “popularization and elevation”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econd, it is the policy of “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culture after the New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The third one is the cultural strategy of “increasing our cultural confidence, adhering to the approach of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The latest strategy is the embodimen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hird leap”, 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leap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dapts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our times. I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on building the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strategy embodies the Party’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ivity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nd demonstrates the independence, freedom and confidence of culture builders who treat cultures in a sound,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manner. Guided by the Party’s cultural policy and following historic logic,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s increasingly focusing on the mission of building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ough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words: Xi Jinping cultural thoughts;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Two combinations”; Popularization and elevation; “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Cultural confidence,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责任编辑:丁培卫 郝云飞]